

《周易》与兵法

姜国柱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易》与兵法 / 姜国柱著 .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7. 9

ISBN 7—5626—0849—0

I. 周… II. 姜… III. 周易—应用—兵法 IV.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9719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 66769235

石油管道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1.60 元

目 录

一、《周易》的兵法	1
(一) 兵为大事，重战习武	1
(二) 兵为凶事，为义而战	11
(三) 认识战争，决策战争	14
(四) 运用矛盾，指挥战争	20
(五) 选人任官，严格治军	25
(六) 兵不厌诈，诱敌取胜	29
(七) 对待战俘，讲究策略	32
(八) 建立邦交，和平共悦	35
二、兵家的用兵之谋	40
(一) 《六韬》的军事韬略	40
(二) 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	51
(三) 田穰苴的治军谋胜之略	62
(四) 吴起的军事谋略智慧	67
(五) 孙膑的军事智胜之谋	74
(六) 尉缭的人谋取胜之智	82
(七) 《三略》的用兵之略	91
(八) 曹操的用兵制胜之术	98
(九) 诸葛亮的用兵制胜之智	104

(十) 李靖的用兵取胜之法.....	114
三、道家的用兵之略.....	124
(一) 老聃的用兵之略.....	124
(二) 范蠡的用兵之略.....	135
(三) 《黄帝四经》的用兵之略	140
(四) 文子的用兵之谋.....	147
(五) 《吕氏春秋》的兵略	156
(六) 《淮南子》的用兵之略	165
(七) 李筌的用兵之略.....	177
四、儒家的用兵之道.....	186
(一) 孔丘的用兵之道.....	186
(二) 孟轲的用兵之道.....	194
(三) 荀况的用兵之道.....	207

一、《周易》的兵法

《周易》是记录周朝社会生活之作，是为挽救周王室危亡而作。要挽救周王室，除了要采取德治、人治等政治措施外，还要采取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战争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决定了论兵、议兵的内容，在《周易》中实在记录其他事情之上。郭沫若说：“战争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这是谁也可以想像得到。《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①这个论断是十分确当的。下面我们将对《周易》的兵法、兵论，作具体分析论述。

（一）兵为大事，重战习武

人类发展之始，为了求得生存、繁衍，就必须非常重视“生养”和“防卫”之事。为了生养就要劳动，索取物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0 页。

质生活资料；为了防卫就要采用必要的措施、手段，而战争则是与生养紧密相关的重要防卫手段。因此，“生养”和“防卫”，则为人之大事，国之大事。对于“兵”（军事行动）这个大事，古今中外，各家各派，都极为重视，深究详察，并把“谋略”、“战争”视为捍卫国家、民族生活的职能、手段。恩格斯在论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战争时，说：“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① 于此说来，战争与民族生活密切相关，而成为国家、民族的大事。兵为国之大事，兵的基本的职能是进行战争，夺取胜利。因此，战争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可以说是史不绝书，举不胜举。中国的先民们在蒙昧时代，为了“生养”而采集食物和狩猎动物，常常发生手持石块、木棒的武器暴力冲突，这大概就是先贤们所朦胧追忆的：“兽处群居，以力相争。”^②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③ “当舜之时，有苗不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② 《管子·君臣》。

③ 《荀子·富国》。

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①“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②战争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由来已久的。据考古学发现，远在北京人时期就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从考古所发现的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材料中可见，其完整无伤者甚少，多数为打击伤痕。据此，考古学家断定：这些带伤痕骨化石是被吃掉的战俘遗骨，从而“可以肯定远古的北京人有食人之风”。这就说明，远古时代以食人为目的的武装冲突，在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神农时期，有了原始农业，由于人口增加，食物来源减少，神农教民稼穑。“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③神农时代，战争不断，古代典籍，常常论及。“昔者，神农伐补遂。”^④“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⑤司马迁在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淮南子·兵略训》。

③ 《白虎通·号》。

④ 《战国策·秦策》。

⑤ 《吕氏春秋·用民》。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凡此种种，都说明战争的频繁而重要。由于氏族部落集团的增多，需要大片的森林、土地进行狩猎采集和游牧农业，使部落集团的接触日益增多，彼此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因而使战争连绵不断。据史书记载和传说，我国古代著名的大的战争有：一是神农与斧遂之战；二是共工与蚩尤之战；三是黄帝与蚩尤之战；四是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经过“三战”“然后得其志”。^①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又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从而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命运。战争给中华民族的文明社会刻上了深深的印记，并对形成中国国家的特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的经常化、突出化，使战争的参加者、指挥者、决策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加强，战争中的军事首领，则为后来的政治领袖准备了人才。恩格斯说：“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起

① 《史记·五帝本纪》。

来的。”^① 恩格斯的论断亦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情况。从中国最早的军事首领之一的诸侯的产生、形成来看，这种官员是属于那种有结果的一类。杨树达说：“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之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义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之形影也。”^②这就告诉人们，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官员，最初起源于战争中的军事首领，后来沿用了军事首领的称号。由此说明军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由于战争在原始人和文明时代人的生活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周易》中关于“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从中我们看出，古人确实把兵视为国之大事。从殷商时代出现的甲骨文中，可以证明，卜祭祀占首位，卜征战是重要一项。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③ 正是此义。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

② 《积微居金文说》卷一《矢令彞三跋》。

③ 《左传》成公十三年。

关于兵为国之大事，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易》中常常论及。《坤·六三》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王训为大，王事就是大事，即指战争。我们已经说过，古代国家都把战争和祭祀看成大事，这里说的王事就是指战争。很显然周人也是这样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周易》中讲农业的几个专卦，都讲到战争。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业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把农业与战争紧密联系起来，亦说明战争的重要性，故把战争视为“王事”。《坤·六三》是说：大地物产丰富，山河文彩秀丽，是非常好的景象，可是有人看到这富丽美景，就要发动战争，进行掠夺。要制止敌人的侵略掠夺，就要以战争制止战争了。

因此，周人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方面注意与周边国家修好，通商往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对侵掠者进行战争征伐。《坤》卦辞中说：“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对此，李镜池解释道：“‘有攸往’是说行旅，实际是商旅。周人经营商业的都是贵族君子。经商要认得路，但卦辞中所说的君子却开始迷了路，后来才遇上了招待客人的房东。商人到各地做生意，为什么‘利西南’呢？因为周人西南多友邦，跟周武王伐纣的就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多在西南，所以周人到西南各国去能赚钱。而在东北却有个强敌鬼方。殷周联军伐鬼方，打了三年才战胜了它。到

强敌处做生意，往往被人抢劫，所以会丧朋。”^①这个看法是公允而符合历史事实的。就是说，到友好国家去做买卖可以赚钱、发展经济，到敌国去做买卖则会丧失钱财的。

关于殷、周联军征伐鬼方一事，《周易》与其他史籍中都有记载。《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这是说，在殷高宗武丁时代，北方有一个强敌鬼方威胁、侵扰了殷商，也威胁、侵扰了周人，所以殷、周联军，经过三年的浴血战争，最终打败了鬼方。经过连年、长期的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却损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周人虽然受到大殷国的赏赐，但是却死伤了不少士卒，所以战争这个大事，“小人勿用”。

由于战争频繁、规模扩大，所以军事首领——武人的地位也得到加强、提高，往往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人们的进退、去留，都要由他们来决定，并且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巽·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就是明证。

战争既然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又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显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对战争要极为重视、认真准备了。因此，《周易》中对重战习武、有备无患的战争观念，多有说明。《同人》卦，集中体现了这个思想。卦辞云：“同人于野。”《初九》云：“同人于门。”《六二》云：

① 《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7年9月版，第5—6页。

“同人于宗。”“同”，《说文》：“同，会合也。”郑玄笺：“同，聚也。”“同”为聚合之义，“同人”为聚合众人之义。“同人于野”，“野”为郊外，这里说在郊外聚合众人，挑选士兵。《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说：“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凡有征伐、田猎之事，征用民众，则聚集于郊外，挑选士兵。“同人于门”，“门”为王门，这是作战前的准备和训练，教民习武练战，不教而战，等于叫民去送死。《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国家发生了大事，召集万民集于王门征询意见，同时要令无节者不得通行，以防止敌人的奸寇潜入。“大故”可理解为大事，大事之一为战争行动，召集征询万民，进行战争准备，有备而无患。“同人于宗”，“宗”为宗庙，《说文》：“宗，尊祖也。”战争之前，必须在宗庙之前聚合，卜祷吉凶，受命于祖先。《左传》庄公八年说：“治兵于庙，礼也。”通过宗庙之礼，进行战争的誓师动员，鼓舞士气，发动战争。“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总观卦爻辞，虽然聚合众人于三个不同的地方，但却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则是选练士卒，准备战争，大概在郊外是选练，在王门是准备出发，在宗庙是誓师，总之是战前准备。

《周易》的作者，认识到战争是突发事件和有备无患的道理。《离》卦中集中阐发了这个思想。从该卦的卦爻辞中所讲战况、战祸的内容，告诉人们要重视战争，准备战争，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做到有备无患。卦中《九三》说：“日

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这是描述敌人一次突然袭击的情况：一个黄昏，敌人突然袭击，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了。妇女和儿童们在齐声高喊，这不是唱歌，因为没有乐器伴奏，而是呼叫抗敌；老头们无力抗敌，只在那里叹息；壮男们当然是在抗击敌人了。《九四》说：“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这是描述敌人的另一次袭击的情况：敌人突如其来，进行袭击，能烧就烧，能杀就杀，抓到小孩就摔，极为残暴，被袭击者损失惨重。经过这两次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后，人们从残酷的战争中，吸取了血的教训，痛定思痛，认真准备战争，这样就可以化险为夷，逢凶化吉了。所以《六五》说：“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虽然如此，但也总不能被动的防备敌人，而要想出根本的对敌之策，以求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就是经过充分的战争准备后，要反击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上九》说：“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在国王的率领下，周人进行了反击战，把有嘉国的国君斩首，抓到了许多俘虏。经过周人的这次反击，有嘉国从此灭亡了，周人安全了，故“无咎”。

在《周易》的重战备战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就是提高警惕，警戒敌人，防止偷袭。《周易》中常常讲到：敌人虽然来袭击，但由于有了警惕戒备，作好了迎敌准备，而最终平安无事了。《离·初九》说：“履错然，敬之，无咎。”听到了错杂的脚步声，原来是发现了敌人来侵犯，大家提高了警惕，作好了迎战的准备，终于制止了

灾祸的发生。

如果不提高警惕，随时加强警戒，则会遭殃的。《泰·六四》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这是说，由于夸夸其谈，能言善辩，说大话，不注意警惕敌人的侵犯，结果敌人来侵犯，而与邻人一同遭祸，还使有些人被俘虏。这就使“泰”转化为“否”，从中告诉人们要随时加强警戒，不可麻痹大意。

《周易》的作者还告诉人们，即使战胜了敌人，暂时排除了祸患，也不能放松警惕，仍要警戒敌人的袭击。《小畜·六四》说：“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即当敌人来抢粮食时，把他打败了，俘虏了，虽然忧患已去，但是还必须加强警戒。因为在《周易》的时代，经常发生敌人掠夺庄稼、抢夺粮食的事件，所以《周易》中在讲到农业的卦爻辞中，都说到此类内容。在当时的野蛮人看来，掠夺要比自己劳动所得来得更快、更容易，故他们把掠夺战争视为自己的常业。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①由于掠夺战争的屡屡发生，在以农业为国民生活之本的国家、民族中，保卫庄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稼和粮食则是进行战争、防御战争的首要任务之一，因此《周易》中在几个农业的专卦中，而每每占卜此事。如《大畜·九三》说：“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这里共占问了四件事：一占良马交配，繁殖马匹，因马匹与农战紧密相关；二占旱灾吉凶，而得吉兆，说明危害不大；三占每日练车战防卫之事，应付敌人，保卫庄稼；四占商旅之事，不是主要项目。由此可见战争防卫与农业生产在周人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事项。同时亦告诉我们《周易》作者关于战争的观点是相当成熟的。

（二）兵为凶事，为义而战

《周易》的作者在肯定战争为国家、民族的大事，认真备战习武的同时，又认识到战争为凶险之事，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利益，要进行防卫战争，不可发动侵略战争。对于来犯的侵略者要予以打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旨在保存自己，不是为了侵犯别人。即为了“御寇”，不是为了“为寇”。《蒙·上九》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愚昧无知的侵略者，来侵犯、掠夺我，我予以还击，而取得了胜利，天下人就会赞许；如果我无端的去袭击、侵犯蒙昧无知的人，虽然有利可图，但却会招致天下人的嫉恨。因此说“不利为寇，利御寇”。这说明《周易》的作者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能正确判断战争的是与非、利与

不利的问题，从而主张正义的防御战争，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亦是光彩的。

《周易》的作者基于这种认识，主张对于那些靠侵略邻国、邻族的侵略者，不必无原则地一再谦让，而要分清是非曲直，适当侵伐，予以惩治，则是应该的。《谦·六五》说：“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由于邻人盗窃其财富而使家贫，由于邻国寇掠其财富而使国贫。对于这样的邻人、邻国，进行打击、侵伐，是名正言顺，有理有利的。否则，便是后患无穷，所以说“利用侵伐，无不利”。

《周易》的作者认识到：对邻人、邻国是否“利用侵伐”，是否谦让容忍，要以原则是非为标准，不能无原则、无是非地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这样不仅会成为投降主义者，而且会招致敌人更大的进犯。为此，《周易》的作者主张“鸣谦”。《谦·六二》说：“鸣谦。贞吉。”分辨是非曲直之后，再决定谦让，这是明智的谦让，否则便是愚蠢者。对待强敌的侵犯，不能无原则地谦让、容忍，要坚决予以反击、征讨。《谦·上六》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明智的人，在反击侵略者时，要“利用侵伐”，“利用行师”，打出国门之外，彻底征服入侵者。这种反击、征伐，则会收到四方响风，万民慕德之效，而有东征西怨之思，箪食壶浆之迎。就是说，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为正义而战，取得了胜利，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应当受到奖赏。《未济·九四》说：“贞吉。悔亡。震用伐

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是说，“小邦周”，配合“大国殷”，讨伐鬼方，打了三年，胜利之后，受到了“大国殷”的赏赐。对这种赏赐，《未济·六五》说：“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打了胜仗，俘虏了敌人，获得了胜利，受到了奖励，这是君子的光荣，是吉利之事。

《周易》的作者，对战争胜利后，凯旋归来，班师回朝的喜忧场面，亦作了记载。《中孚·六三》说：“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打了胜仗，虏得了敌人，有的击鼓庆贺胜利，有的精疲力竭班师，有的悲哀流泪，有的高兴唱歌。战争胜利了，固然应当庆祝，但战争的胜利，毕竟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所以有人在哭泣、流泪。这就告诉人们，战争的胜利是利中而有害的，战争的失败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故以此为好战者警。《坤·六三》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从事战争的人，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要终止战争。周人看到兵为凶事，战争为患祸之源的现实，为此主张废止战争。这个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由此出发，《周易》的作者，反对武人掌握最高政治权力，成为君王。肯定这是凶事，不是吉事。在他们看来，武人只能掌握军权，不可成为国君。《履·六三》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眼睛有毛病却能看见，脚跛了却能走路。踩到老虎尾巴而被咬了，但愿是一场噩梦。武人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这是不好的凶兆。

《周易》的作者认识到，兵为凶险之事，武人掌权是凶